

# 媒介暴力、信息伦理与传播民主的议题建构

邵培仁 范红霞

**摘要:**把对媒介暴力的思考,突破效果研究的范畴,转而从信息伦理角度,以及从暴力与民主的关系角度而提出的传播民主问题建构议题。重新审视了媒介暴力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杜绝媒介暴力,除了重提社会责任,倡导媒介自律外,加强法律监管更是重中之重。并且,只有充分扩大舆论民主,保证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才能消除信息暴力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媒介暴力;信息伦理;传播民主;权力;信息暴力

**作者简介:**邵培仁,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8)

范红霞,女,博士生,《当代传播》编辑部主任。(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6-0001-07

## 一、媒介暴力议题的提出

暴力行为几乎是伴随着人类历史而产生的,但暴力文化的形成却是借助大众媒介而得以表现、形成和推广,并且对人们的心理、认知及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自上世纪20、30年代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兴起以后,出现在媒介中的暴力内容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社会的犯罪率和暴力行为也日益增加,关于媒介暴力是否会引发犯罪的问题,引起人们普遍的担忧,尤其是电视暴力节目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是备受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作为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媒介暴力研究在美国逐渐兴起。经过50多年的发展,从“强效果论”、“弱效果论”到“有限效果论”再到“使用与满足”理论的逐渐深化,人们关于媒介暴力的认知也日渐丰富和多元,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此外,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从电影、电视到网络、电子游戏等等,媒介形式的多元化也不断拓宽媒介暴力研究的视野和话语领域。

## 二、媒介暴力的内涵、起源与研究综述

### (一) 什么是“媒介暴力”

暴力是一种通过强制性手段侵犯他人的极端行为,与攻击、武力等行为密切相关。而暴力行为在媒介中的反映和表现,则构成了媒介暴力。一般而言,对于媒介暴力,主要是指电影、电视、书籍、电子游戏、互联网等媒介中含有或刊载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这个定义主要反映了媒介内容方面呈现的暴力倾向。另外还有一种含义是指“媒体暴力”,即媒介利用议程设置和话语霸权造成的对个体或是群体的伤害。<sup>[1]</sup>这种提法直接将媒介自身也定义为施暴者。

有学者从媒介建构的角度提炼出“媒介暴力”的三重内涵:媒介中的暴力内容;媒介自身的象征暴力;媒介与受众共同建构的“暴力世界”。这一定义从内容、媒介自身及其作用方面丰富和拓展了媒介暴力的内涵,并为媒介暴力研究的深化拓宽了基础。<sup>[2](119)</sup>

### (二) 国外媒介暴力研究的起源和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媒体与暴力研究,与电视在美国的全面普及有关。尽管在此之前,随着20年代美国电影业的兴起,电影中的大量关于犯罪和性的内容引起了人们对其影响的担忧,一些社会学

家开始对此现象进行研究。佩恩基金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的。1928年,美国电影研究委员会主席肖特(William. H. Short)邀请了一批大学里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育学家进行了13项专题研究,专门研究电影对儿童各方面的影响。这项研究从1929—1932年历时三年,主要研究分析了电影的内容构成和社会影响,最终结集出版了10本书。佩恩基金会的关于电影研究的成果为日后的媒介暴力效果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关于认知、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研究也成为媒介暴力效果研究中采取的主要理论视角。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媒体与暴力研究,与电视在美国的全面普及有关。1955年,佩恩基金会召集了一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针对媒介产品中的暴力内容,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进行详尽的分析,被看作是媒介暴力研究的开端,也是当时效果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过50多年的研究积累,美国的传播学者们关于媒介暴力这一议题,在长期的经验研究中逐渐确立了以效果研究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并发展出了很多理论。如社会学习理论、涵化理论、预示假说、脱敏理论、媒介的激发——诱导假说、象征性宣泄理论等。其中,尤以涵化理论和激发——诱导假说的运用最为广泛。

国外(主要是美国)的暴力效果研究充分展现了美国经验研究的特点,定量分析方法、实地调查和实验法的采用,为暴力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提高了研究的可信度。在研究对象上,儿童和青少年成为其主要的关注对象,从社会暴力等现实问题来思考媒介与暴力的关系,从而使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研究中提出的诸多理论都有实验数据作为依据,可靠性和可信度很高,为中国的媒介暴力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 (三) 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

笔者搜集到的资料主要以中国大陆的研究为主。最早的一篇论文是孙玮、刘荣忠2000年发表的《媒介是如何反映暴力现象的?——中美暴力新闻报道比较》<sup>[3]</sup>,是对报纸上的暴力内容进行的实证研究。

专著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卜卫的著作《大众媒介与儿童》中列专门章节《媒介暴力的影响及其控制》,对国外媒介暴力效果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学者龙耘的专著(2005年)《电视与暴力——中国媒介涵化效果的实证研究》,首次尝试以实证方式对电视的暴力内容进行分析,以量化形式反映电视暴力的指向和强度,以质化分析解释各项指标所蕴含的意义,通过对收视时间、受众差异和收视状态进行的涵化分析,以及对北京、上海、兰州三地的受众调查,分析电视暴力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差异以及电视暴力对受众观念、认知及态度层面的涵化影响,是中国媒介暴力效果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并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复旦大学博士王玲宁的专著《社会学视野下的媒介暴力效果研究》在汲取龙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媒介/社会的角度,将媒介暴力效果理论置于中国语境下进行验证和分析,着重分析了视觉文化时代的影像暴力表达及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对中国媒介暴力涵化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石义彬、彭飏的译著《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中有一章对国外的媒介暴力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扫描和推介,同时也指出了其研究的不足。

论文方面,笔者以媒介、暴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搜索,得到的相关论文大部分发表于2007年以后,说明媒介暴力研究在2007年后逐渐成为中国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议题。

总体来看,国内的媒介暴力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和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影响上,主要考察媒介暴力对儿童、青少年心理、人格和社会认知方面的影响。以媒介发展为脉络进行的暴力研究基本上沿用了美国媒介暴力效果研究的思路。诚如麦奎尔所指出的,随着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对其暴力传播效果的担忧都会出现。<sup>[4](313)</sup>国内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具体的媒介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理论阐释为主,抽样调查和数量统计等定量研究法采用较少。在效果研究方面,偶见以实验方式进行的相关研究,但只限于操作简便、易于数据搜集的方法。如郭晓丽利用生物反馈仪测量被试主动参与或被

动观看过程中及其前后的皮电和心率变化，来检测脱敏效应是否起作用。<sup>①</sup>

### 三、伦理价值——媒介暴力与现实暴力的关系

媒介暴力和现实暴力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这是媒介暴力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媒介暴力效果的关注，尽管可以从个体认知和社会影响等角度进行探查，但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人们对于媒介伦理价值的关注。

对媒介暴力影响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受众为什么喜欢观看暴力？媒介为什么乐于展示暴力？媒介暴力会导致现实的暴力行为吗？

#### （一）暴力需求的虚假繁荣——恐惧、英雄梦和象征性宣泄

人类使用暴力是有历史渊源的。对暴力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早期的人类要想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他们狩猎以取食，斗争以安居，必然要遵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这种自然选择就是一个暴力过程。人类用暴力书写历史，用刀光剑影为自己的生存开辟道路，历史也需要通过暴力来完成。一代代的王朝兴替、开疆扩土的丰功伟绩，莫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通过战争、杀戮、征服来完成。古代战争仪式隆重而复杂，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血祭，或以牺牲活人，或以牛羊代替作为神圣的祭品，仪式本身就是血腥的，意在彰显暴力，体现了一种生命力的爆发，一种生存权利的扩张。

对力量和暴力的崇尚，这种审美需求转变为人对自身能力的欣赏。从与自然和野兽的斗争到人类内部暴力的最高形式——战争，人类一步步为自身争取着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崇尚暴力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对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两种相互矛盾的文化心理共存于人类文明中，形成了独特的暴力文化景观。人们惧怕战争暴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观看行刑是一场令人兴奋的“仪式”。在中外的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关于行刑场景的展示和描写。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的开篇就以极其详尽的笔墨，描写了一次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残酷恐怖的行刑过程，以此来说明中世纪里以惩罚肉体来显示权力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在中国，也向来不缺少热衷于“看杀头”的“看客”，中国的二十四史里还专门为酷吏列传，穷形尽相地记载各种折磨人的酷刑。一些文艺作品里更是以艺术的手法对暴力行为（如莫言的《檀香刑》）进行极致的描写，刻画中国人的生命激情和悲剧人格。在人们的意识里，越是觉得恐惧，越发觉得刺激，就越容易产生趋之若鹜的心理。在文明社会，暴力行为受到压抑，需要宣泄的途径，媒介暴力以虚幻的形式排解了人们焦虑、暴躁的暴力情绪，为之找到了法律和道德的合理出口。

从文化心理和认知倾向来说，暴力也能满足人们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声张正义的英雄情结，尤其是当暴力被涂抹上正义色彩时，暴力行为变得更加容易接受。在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日益流行的时代，满足甚至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成为日益商业化的文化产业的主要目标。如此一来，为迎合人们的观赏趣味，借助文字、画面、声音和情节等描述暴力、宣扬暴力和美化暴力的各种媒介产品日益泛滥。

但是，对于暴力节目是我们真实的需求吗？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人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呢？如果有些需求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人们的需求只是外部强加的呢？马尔库塞指出：市场力量总是引导我们相信与“真实需求”有很大差距的“虚假需求”。“不管这些需求能否成为个人自己的需求，为他的生存条件所允许；不管个人是否能够从这些需求中实现自我，获得满足。”<sup>[5]</sup>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视觉文化时代，商业利益所催生的暴力文化并不能给社会文明带来益处，只是满足人们潜在的欲望而已。

#### （二）媒介暴力出现的动机

媒介为什么喜欢展示暴力？因为“暴力行为大多数都是有新闻价值的。”<sup>[6]</sup>暴力娱乐节目带来利益的原因

① 郭晓丽：《主动参与与被动观看暴力电子游戏即时脱敏效应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是观众喜欢看这类节目。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率,媒体就会大量制作此类暴力报道或者作品来迎合这种需求。“据统计,除了对当权者的赞誉之外,风险、性、名人、暴力等要素成了传媒90%的报道内容,戏剧化和娱乐性成了决定能否登上新闻日程的重要参照。”<sup>[7]</sup>克雷顿·克萊默通过对国家新闻杂志连续七年对大规模凶杀事件的报道,发现这些凶杀事件所占比例很大,这些事件中有一些明显与随后的暴力事件有因果关系。“虽然公众的兴趣是大量报道凶杀案的原因之一,但是利润才是真正的动机,因为媒体是要赚钱的行业。”<sup>①</sup>媒介从销售暴力节目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逐利动机,塑造“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形象,因此媒介往往拒绝承认自己和暴力节目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对于媒介伦理的强调自大众媒介兴起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电视、网络、动漫游戏等新媒体的出现,媒介暴力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而且“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已经被当作很重要的舆论形态,被视作‘第五权力’。网络上的适度的言论自由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建构和谐社会很有帮助,然而一旦超越边界,对他人的隐私和自由造成危害,就容易演变为网络暴力。”<sup>[8]</sup>因为网络的互动性、广泛性和匿名性,导致近年来网络暴力由于其裁量困难、兼有利弊且具有法不责众的免责倾向而日益严重,加强对网络文化和网络舆论的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

### (三) 媒介暴力与现实暴力的相关性论证

乔治·格伯纳的实验表明,接触过多媒介暴力的人会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充满暴力的,导致对现实的一种错误认知,产生悲观认识。班杜拉·罗斯等人在他们的实验中证明,当模仿的原型得到奖励而不是受到惩罚时,儿童更有可能模仿攻击性行为。伍德·瓦纳和查歇尔总结了关于孩子、侵犯性行为和媒体暴力关系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媒体暴力和侵犯性行为之间有重大的相连关系。他们也承认孩子比较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在实验室背景中,得到的结果都表明接触媒介暴力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尽管研究人员、专业协会和组织的诸多论述都一直认为接触媒介暴力与攻击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是这种观点也受到了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和雷纳德·艾龙(Leonard Eron)等人的反对。他们对媒介暴力影响研究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证明接触媒介暴力与现实的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表示质疑。<sup>[9]</sup>蒋建国、张子娟从分析201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多起校园杀童血案入手,探讨媒介暴力是否引发了现实暴力。虽然其结论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关于媒体报道所产生的负面“示范效应”,也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sup>②</sup>

总的来说,尽管存在争论,但是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媒介暴力和现实暴力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 (1) 确有相关性——媒介暴力通过“接触—感受—实践”机制对个体和社会产生影响

媒介具有社会建构作用,它在我们的头脑中建构起对社会的认知和世界的意义。对暴力而言,“人们头脑里对现实的映像更像报纸所描述的歪曲的暴力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Meyer将其称之为“感知模式的扭曲效果”<sup>[10]</sup>。威尔逊等人的研究表明,观看电视暴力有三种主要效果:学习攻击性态度和行为;对暴力不敏感;增加对暴力的恐惧。<sup>[11]</sup>L.J.施勒姆从易接近性和媒介效果角度考察暴力情境对行为的影响,认为,媒介作品提供“脚本”或情景模式。一旦某一特定概念如攻击、愤怒等被激活,相应的与该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为脚本如犯罪、暴力等也同样被激活。<sup>③</sup>就暴力模仿而言,“一个含有暴力镜头的内容能够引起模仿的可能性的可能与暴力的呈现方式有关。”具备以下因素则会较大可能引起模仿:①有魅力的罪犯;②正义的暴力行为;③对暴力行为的奖励;④暴力中使用传统武器;⑤现实中的暴力;⑥幽默;⑦非正义的暴力行为;⑧惩罚;⑨痛和有害的提示。<sup>④</sup>而影像文化中所谓的“暴力美学”通过采取以

① 克雷顿·克萊默.《大众媒体关于大规模凶杀事件报道的道德问题》.转引自乔尔·鲁蒂诺、安东尼·格雷博什著:《媒体与信息伦理学》[M],霍政欣、罗赞、陈莉、曹海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3.

② 蒋建国、张子娟.“突发公共事件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

③ L.J.施勒姆.《媒介消费与社会现实认知:媒介效果及其内在过程》.转引自【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主编.《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石义彬、彭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57.

④ 姜喆.《从电视对个体行为影响模式解析儿童与电视暴力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合理暴力的形式获得认同、关注暴力行为本身而忽略暴力后果、将严重的暴力行为轻描淡写形成脱敏效果、忽视反暴力的主题等操作手法，以美好的形式包裹暴力的血腥残暴和严重后果，对观众产生了麻醉作用，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暴力观念的灌输。这种艺术手法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很强，对缺乏辨别力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很容易接受其灌输的“以暴制暴”、以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对其态度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

媒介暴力在建构和影响人们对于社会暴力的认知方面具有作用，在引发具体犯罪或其他攻击性行为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对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确凿无疑的因果关系，由于目前的研究只能根据实验或者调查结果作出解释，只能提供间接证据，而缺乏直接证据加以证明。

## (2) 媒介和大众文化只是促成社会暴力的诸多因素的一部分

尽管多数长期的实地研究表明，在观看电视暴力和随后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整体来说关联性并不强（皮尔森相关系数在0.15~0.32之间）。<sup>[12]</sup>因为存在个体差异等自变量的差异，所以，不是所有的暴力都会产生同样的伤害效果，也不是所有的观众都会通过相同的方式受到暴力的影响，但是会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影响。如人格差异、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人行为。儿童的可塑性强，辨别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媒介暴力的影响。此外，媒介研究学者也发现，大多数媒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行为模仿还受到其他中介因素的影响。“如研究发现：大多数家庭关系不正常的儿童更喜欢接触暴力内容，并且更容易模仿暴力行为。……但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喜欢接触暴力内容的孩子发生模仿的几率就小得多。”<sup>[13]</sup>詹姆斯·罗尔也得出相似的观点：“无论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如何，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和限制。”<sup>[14](101)</sup>“媒介和通俗文化只是促成社会暴力的诸多因素的一部分，这些因素尤其包括不幸或充满暴力的家庭生活、糟糕的邻里环境和容易得到的危险武器。”<sup>[14](112)</sup>

研究者的态度倾向于认为，媒介暴力对儿童能够产生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媒介因素和儿童的生活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据此推导，媒介和大众文化只是促成社会暴力的诸多因素中的一部分。

## 四、媒介暴力与传播民主的关系

### (一) 媒介暴力问题体现着深层的权力问题

暴力是通过激烈的、甚至是极端行为来表达诉求和欲望的方式。施密特和德卡拉夫（Schmid & de Craf, 1982）指出，暴力是一种接触媒介渠道的使用方式，暴力本身也是一种媒介信息。<sup>[4](339)</sup>大众媒介“传播意识形态的总体思想，促进特定的观念的形成，并且排除异己，将意识形态变化与权力根本相联”<sup>[2](117)</sup>，大众传播从观念和态度上完成对暴力世界的双重建构。借助媒介的力量，暴力观念和暴力行为得以迅速而广泛的扩散和大规模复制，造成暴力话语的盛行。暴力话语在日常生活、政治场域和虚拟空间中都能发挥作用。

暴力也反映了一种利益表达。国家权力结构与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与社会心理结构有着深远而隐匿的联系。当前面对居高不下的高房价、面对野蛮的暴力拆迁、面对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其“马太效应”，一种普遍的社会“怨恨感”油然而生。由于个体利益表达渠道的极度缺失，多元表达的机制付之阙如，人们遭受权力欺凌的时候，呼告无门。在民主消失的地方，暴力应运而生。因之，暴力成为反抗压迫、宣泄不满情绪、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极端行为。“出于被支配、被操纵地位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挑战、对抗出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或与之协商，从而在权力谱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sup>[15]</sup>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媒介暴力的主题反映的就是以暴制暴，或者替天行道、声张正义，让恶人、贪官污吏受到惩罚。“作为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流行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于社会结构性力量的限制之外的。霸权与从属、抵抗与屈服、对抗与合谋从来都是并存于流行文化之中的。”<sup>[15]</sup>大众传媒仍然是最具实力的现代权威<sup>[14](106)</sup>，拥有或控制了大众媒体，特别是电子媒体，将意味着拥有了无可匹敌的社会权力。这也是各国都实行严格的媒体控制的政治根源。

从民间的层面来说，媒介权力的影响也清晰可见。在一些集体暴力事件中，媒介的传播也会产生负面

作用。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报道固然会引起舆论哗然，但是对媒介的封锁会激起群众更大程度的“怨恨”和不满，导致集群行为的发生。“研究发现，媒体可以以各种方式引发骚乱、塑造暴动文化、传授暴动的技巧并推动骚乱的区域蔓延。”<sup>[4](400)</sup>因为媒体的描述，“即便媒介最终是站在维护既有秩序的立场上，在某些情况下仍可以在无意中加剧两极对立。”<sup>[4](400)</sup>我们看到，无论媒介是“无所作为”还是“有所作为”，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

## （二）舆论民主与信息暴力

关于媒介暴力问题，人们大多关注媒介所呈现的暴力内容，以及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但是学者们最近以来关注到了另一种“媒介暴力”，即媒体利用议程设置和话语霸权造成的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损害。传播学者怀特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即媒体对社会上的信息进行“把关”、取舍，决定了哪些内容最终进入媒介与受众见面。大众媒介利用这一特殊的地位实现了对话语权的控制。这种“把关”行为就构成了一种“象征暴力”。“这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加或在承受。”<sup>[16]</sup>媒介化社会里，媒介对我们的统治已经深入人心，如福柯所言，“权力像水银泻地般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sup>[17]</sup>其“象征暴力”对我们进行潜移默化的统治，控制着我们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最终导致的就是“主流化效果”。人们完全被整合进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去，只关注日常生活而忽视重大新闻或政治新闻，最终扼杀了公众的民主意识。

在文化工业时代，媒介的“象征暴力”体现的是一种商业和文化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一方面，商业利益日益侵蚀文化和艺术作品的创造基础和价值追求。为迎合市场需要导致影视文学艺术中的暴力内容大量出现，使媒介暴力的问题愈演愈烈。作为一种符号暴力，媒介所塑造的“黑暗社会”满足了社会公众对于“卑鄙世界”的臆想，逐渐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暴力价值观，认为“以暴制暴”是合理的手段，这对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制社会来说无异于是一种观念的倒退。而且，媒介自身作为施暴者所行使的“媒介暴力”造成的社会伤害也不可低估。媒体对某些特殊社会行为或特殊群体定位为反叛社会的或是危害社会的，对他们进行“污名化”，制造其反社会的“刻板印象”，夸大其危害，构成社会歧视。这些歧视被加之于某些特殊人群如某些性工作者（现在叫失足妇女）、性问题者、吸毒者、传染病人、移民、流动人口甚至是穷人身上。媒介对于某些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污名化、歧视性报道和“刻板印象”，造成了一种“隐性暴力”，它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不是短期内或者通过具体行动就可以恢复的。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将媒介污名化问题与风险社会防范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深思。指出，“媒介如果对对象进行污名化报道，将直接影响受众的风险认知，激发潜在风险，放大原有风险甚至导致新的风险，对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sup>①</sup>

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往往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媒介利用“制造共识”机制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获得统治的权力。普通民众不通过大众传媒就很难表达自己的观点，逐渐形成了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于话语的“霸权”。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也使得那些“非主流”的信息或知识，以及不利于政府形象的信息无法进入公众视野，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这也构成了一种“信息暴力”。<sup>[18]</sup>比如，将遭遇强拆的受害者塑造为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的“刁民”，为违法的政府有关部门或房地产公司开脱责任，转移群众视线，为他们的违法行为提供合理性。还有治理城市车辆拥堵问题把报道重点放在查扣打击“黑车”上，而对政府交通管理措施中的漏洞和城市出租车营运权的变相垄断等关键问题却避而不谈。

媒介暴力也是一种表达。在民主不充分的地方，暴力应运而生。媒介暴力作为一种情绪宣泄和强烈的利益诉求，表达一部分群体强烈的期望，当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不够通畅的时候，随着网络的普及，政府对信息传播的引导和把关更加困难，网络也成为网民发泄不满、表达意见、举报犯罪、声张正义的途径。以

① 董小玉、胡杨：《风险社会视域下媒介污名化探析》，“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8月。

网络曝光、“人肉搜索”为代表的“网络暴力”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舆论工具,成为网民参与国家和地方管理,监督官员是否腐败的重要渠道。从2008年以来,网络监督已初见成效。

不可否认,网络上存在着低俗内容,有些人蓄意制造发布虚假信息,实施网络犯罪,侵犯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等,但是,“如果一味强化官员阶层的权利,以保护官员的隐私为借口,弱化网民的监督,动辄给他们扣上‘网络暴力’的帽子,则难免激化社会矛盾,导致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sup>[19]</sup>

## 五、结 语

媒介暴力研究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理论话题,引起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关注,各种理论的交叉研究拓宽了学术视野,其研究范式也不断革新。人们越是关注这个问题,媒介伦理的建构、媒介素养的培育以及社会民主建设就越能从中受益。此外,由此引发的对于儿童、青少年、女性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也会因为人们的重视和呼吁,而使现状得到改观。

杜绝媒介暴力,除了重提社会责任,倡导媒介自律外,加强法律监管更是重中之重。媒介暴力,无论是显性暴力还是隐性暴力都对社会危害甚巨,且流毒深远。学者们要秉承批判精神,对这种现象加强反思,深入剖析其社会意义,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另外,这种现象也暴露出中国媒介开放程度不足的问题。必须扩大舆论民主,充分保障人们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正常的表达途径是畅通的,人们才不会寻求其他方式来表达意愿和发泄不满,也就消除了使用暴力的根源。

### 参考文献:

- [1] 彭晓芸.被混淆的和被忽略的——关于校园惨案的媒介伦理[J].南方传媒研究,2010(24):28.
- [2] 石义彬,张卓.媒介暴力的多重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04(12).
- [3] 王玲宁.社会学视野下的媒介暴力效果研究[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9:10.
- [4]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5] 【法】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
- [6] 乔尔·鲁蒂诺,安东尼·格雷博什.媒体与信息伦理学[M].霍政欣,罗赞,陈莉,曹海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8.
- [7] 【英】伊冯·朱克斯.传媒与犯罪[M].赵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序二.
- [8] 郑永晓,汤俏.“网络暴力”喧嚣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兼论近年来网络文化的监管与疏导[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
- [9] 【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石义彬,彭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00.
- [10] P. Meyer, Ethical Journalism, New York: Longman, 1987.
- [11] Wilson, B. J. & Smith. S. (2002), 'Violence in children's TV programming: assessing the risk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1): 5—35.
- [12] 【美】Richard Jackson Harris. 媒介心理学[M].相德宝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278.
- [13] 卜卫.警惕媒介暴力摧残中国“花朵”[N].科学时报,2007—05—23.
- [14]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M].董洪川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 [15] 石义彬,熊慧.后现代视野下的拼贴文化与权力——以网络“恶搞”视频为例[A].张磊.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C].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84.
- [16]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4.
- [17]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2.
- [18] 陈墨.舆论民主与信息暴力. P R Magazine. 2009(4):45.
- [19] 郑永晓,汤俏.“网络暴力”喧嚣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兼论近年来网络文化的监管与疏导[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0.